

中国考古学会
第十次年会论文集
1999

文物出版社



中国考古学会 第十次年会论文集

1999

中国考古学会编辑
文物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边 漪

封面设计:周小玮

责任印制:张道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论文集. 1999/中国考古学会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 - 7 - 5010 - 2497 - 1

I. 中… II. 中… III. 考古学—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IV. K8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0106 号

中国考古学会 第十次年会论文集

1999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市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787×1092 16开 印张:18.5

ISBN 978 - 7 - 5010 - 2497 - 1 定价:88.00元

目 录

三峡考古的几个问题	徐光冀(1)
三峡考古与巴蜀文化的新探索(纲要)	俞伟超(6)
重庆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白九江 邹后曦(11)
忠县中坝遗址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实践与探索	孙智彬(50)
重庆三峡地区早期巴文化分期初论	方 刚 袁东山(71)
关于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的几个问题	罗二虎(83)
长江三峡库区先秦考古学文化考察(纲要)	郑若葵(105)
三峡地区早期汉民人文聚落成长的个案考察	吴春明 钟礼强(108)
近年巴蜀考古综述	李昭和 马家郁(118)
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文明进程探索	赵殿增(124)
略论西藏考古发现的史前栽培作物	李永宪(138)
青藏高原东麓考古学文化特征及其传播的一般思考	辛中华(152)
近年来西藏西部佛教石窟美术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霍 巍(171)
四川南朝造像	雷玉华(185)
水井街酒坊遗址的发现与探索	陈 剑(219)
再论构筑史前考古新模式	张学海(245)
试论龙虬庄文化	张 敏(253)
良渚文明进程中水患背景的再探讨	宋 建(271)
珠江流域青铜文化初探	覃义生(279)
“禾祖丞印”封泥与“禾祖蕤君”银印考	林 沅(286)
编后记	(290)

三峡考古的几个问题

徐光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我国跨世纪的最大的水利工程。水库总面积为 1084 平方千米，受淹面积 632 平方千米，涉及湖北、重庆一省一市 22 个区县。作为三峡工程组成部分的三峡文物保护工作，也是我国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分为地面和地下两个方面，计 1087 项。其中地下文物 723 项，规划发掘面积 187 万平方米，勘探面积 1200 余万平方米。如何在短期内完成这项艰巨任务，提高田野工作质量，加强课题研究，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全国文物考古界面临着一次空前的机遇和挑战。国家文物局动员组织了全国的文物考古力量，投入到三峡文物考古工作中，湖北、重庆方面制订了有效的管理措施。经过全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全力奋战，三峡文物考古工作已取得初步的重大成果。现仅就三峡考古工作的几个问题，谈谈个人意见。

一 关于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

考古学文化问题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论和方法的问题，特别是史前考古学方面，没有文字，主要是靠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和区系类型的研究来了解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况。考古学文化命名是一项科学严谨的工作，至少要有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一定规模发掘的遗址；二是要有一群具有特征的、有别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类型品，包括陶器和其他类别的遗物；三是要有一个分布的地域。

前一段三峡地区考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发现了一些新的史前时期的遗址，成绩应充分肯定。大家工作热情很高，一时间出现了不少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这些命名有的不够严谨，例如发掘简报还没有发表就提出来新的文化命名，没有发掘简报别人怎么知道新发现的情况？一个新的文化命名起码给人一批有特征的器物，还要有个分布地域，还有总体文化特征。再如一个遗址刚发掘，就提出一个新的文化命名。总需要发掘告一段落，经过一番整理，发表了资料，再提出来。过去我说过“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科学工作做到一定程度，再提出来，就顺理成章了，太急了，是自己给自己找事。还有同一文化性质的遗址，由于不同的地点的发掘，均各自命名，使人无所适从，

考古学的惯例，是以首先发现和发掘的地点命名。

考古学文化命名，需要大家多讨论交流，一些分歧会逐步趋向一致，一些分歧还可以继续研究讨论。

二 关于巴文化的探索问题

对于巴文化的探索，是三峡考古工作的重点课题之一，考古学界很关注，史学界也很关注，抱了很大希望。巴文化的探索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应如何工作，我也谈谈自己的看法。

巴族是个古老的民族，也是个古国，其时期不同地域也不尽相同，在历史上对中华民族有贡献。文献的记载很零星。最早甲骨文有“伐巴方”，那是武丁时期。据《左传》记载，巴是西周王朝的一个属国，“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春秋时，巴时而依附于楚，时而又叛楚，但终不敌楚，向西退缩。巴国的疆域“东至鱼复，西至夔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华阳国志·巴志》）。到战国后期连“枳（今涪陵）”都被占领了，那应是当时楚的西界。到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巴国至少有千年历史。关于巴人的起源，文献记载不一，《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注引《世本》廪君立国的传说，或可信度较大，其起源似应在今鄂西清江流域。

巴的文字不清楚，对巴文化的研究主要是靠考古学，并结合有关文献。巴作为一个国家，也不只是一个民族，巴族是其主体族。怎样从遗迹遗物当中识别巴文化的文化特征，搞清其文化内涵，这是考古学上要探索的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探索过程中要用考古学文化的方法来研究，就像通过研究二里岗文化来研究早商文化，通过研究二里头文化来研究夏文化一样，要经过长时间的讨论研究，意见才会趋于一致。用考古学文化的方法来研究，从考古学文化入手来研究它的特征、它的文化内涵、它的整个发展过程和分期。不必急于给巴文化戴帽子，否则戴上后戴不住还得摘。根据什么戴帽子？有什么证据？我们要从考古学上讲出依据。

三峡工程中，发现了一批相当于商周时期，可能与巴有关的遗址。遗址数量不少，从鄂西到渝东都有分布。在巫山和涪陵之间，有些遗址规模相当大，如双堰塘、李家坝、中坝子、余家坝、管井沟（中坝）、小田溪等，大的有十几万平方米，小的也有几万平方米。双堰塘相当西周时期，出石磬，附近也出过商代铜尊这样的礼器。在李家坝出了战国时期的台基式房址，差不多200平方米，有台基有柱础，规模不小了，应是一个中心。再有李家坝发掘300多个墓，余家坝发掘100多个墓，其中等级也不一样。当然高级的是小田溪，相当于战国晚到秦的时期，我看应该是王一级的墓，出编钟、错金的编钟，带“王”字的铜钲，仿中原的宗庙礼乐，层次已相当高了。对小田溪更应注

意有地方特色的器物（陶器）使我们较易掌握其文化特征，由晚期进而研究早期，这应是探索巴文化的一条路子。同时要找到它相应的遗址。

三峡地区初步的年代学问题解决以后，会给巴文化的探索创造有利条件。再有就是巴文化与楚文化、蜀文化、秦文化的比较，对我们了解它的特点来也是有利条件。楚文化、蜀文化现在知道的比较多，对秦文化知道的也不少。上世纪 40 年代提出来的巴蜀文化，影响很大。巴蜀文化应是两个文化，即巴文化和蜀文化。过去一讲巴蜀文化就是认识它们的共性，现在我们要更多地认识它们的个性。在渝东，楚从东往西，现在发现楚文化的遗址到了忠县，根据文献记载一直到涪陵。秦从西往东，到公元前 316 年将巴灭了，到公元前 278 年将楚的郢都（纪南城）占领了，楚又只得东移。所以我们要通过不同文化的比较，了解巴文化的特点、内涵。这需要时间做工作，我觉得是有信心的。

三 关于历史时期的城址和集镇遗址的发掘

三峡考古工作中，已经对秦汉时期的云阳旧县坪遗址、巴东旧县坪宋代的城址、白帝城南宋抗元山城、秭归东门头明代的城址和云阳明月坝唐代集镇遗址做了发掘。这些城址和集镇遗址的发掘，不仅对三峡考古有重要意义，对整个中国考古学都是有意义的。过去墓葬做得多，城址做得少。而且过去对城址主要是做都城遗址，如汉代都城、唐代都城，已工作多年了，有的甚至已工作半个世纪了。但对于一个汉代的县城遗址、宋代的县城遗址，没有做过大规模的工作。在三峡地区做这些县城、集镇遗址，是开创性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了解沿江城市的特点，这对中国考古学也是一个贡献。

对历史时期遗址的发掘，在工作方法上与史前的遗址有所不同。因为其遗址规模大，像云阳旧县坪遗址，最少有 100 万平方米。那么大的城址怎么做？我想做城址首要的是把全貌和平面布局搞清楚，把范围、平面布局和街道、衙署、民居、城墙、城门的位置弄清，主要通过钻探、通过探沟来了解这些情况。要有好的地形图，万分之一、五千分之一、两千分之一的，将遗迹测到图上把全貌掌握起来。再重点发掘一些地方，比如城门、衙署、手工业作坊、民居等。街道、水道、城墙和城壕等在勘探的基础上，只要解剖几段，整个连起来了就清楚了，城址的功能和布局就出来了。这样就事半功倍，能够掌握全面的情况，而且花的力量不大。如果一下集中在某个地方挖几千平方米，但最后只做了个局部，好像瞎子摸象一样，可能是个象腿，也可能是个尾巴，给考古工作带来严重损失。过去一些同志大遗址做得少，缺乏经验，不清楚怎么控制全局，怎么把全局搞清楚。街道等在勘探的基础上不必全挖，只要探沟解剖就可以了；城墙也是探沟解剖，地层、结构、年代就清楚了。当然峡江地区跟中原不同，有自己的地形地势特点

和其他方面的特点，这要通过我们的工作来认识。在早期遗址挖一万平方米不得了，在云阳旧县坪集中挖一万平方米只是百分之一，可能就弄了个象腿。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同志确实做得不错，讲清楚了就确实做到了。有的地方就做得差一些，老强调完成面积，说：钻探、打探沟，面积任务怎么完成？不是说不要大面积发掘，而是要在了解全面的基础上，在重要部位大面积发掘。这方面的发掘工作需要总结经验，提高田野考古工作的水平。总之，我们在三峡工程中的考古工作，是抢救工作，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因此要做好每个遗址的考古工作，要搞清一个城址的全貌，一个集镇遗址的全貌，而不是一个局部。

四 有关多学科协作的问题

在这次三峡考古工作中，在开展多学科协作方面有了很好的开端。将自然科学的手段应用到考古学研究上，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事，能够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使我们取得更多的资料和信息，来研究当时人类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我想讲的是在多学科协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不是说自然科学的手段拿来就用，这有个相互学习、相互配合、相互探索的过程，是双方面的。考古工作者对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方法要有大致的了解，自然科学工作者对考古学的原理和方法也要有大致了解，这样才能相互理解、相互配合，取得成果。

考古工作者要掌握在野外采集标本和样品的方法，或者同自然科学工作者一同采集，对不同层位不同单位的标本要分别采集，特别要注意不要有后世的标本混入。1950年代发生过西晋时期周处墓发现铝的问题。当时经检测确定是铝，铝难提炼，西方到19世纪才提炼出来。西晋时期发现铝，这当然是一件大事，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报道，连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也写进去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铝片是后世混入的，至1972年夏鼐发表《西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考古》1972年4期）一文才予纠正。因此，我们在提供样品检测时，一定要本着科学严谨的精神。

碳-14测年在我国已有40多年的历史，对考古学的年代，主要对史前考古学的年代框架的建立，极有价值。一个地点做的数据越多，参考价值越大，可知其年代范围，可以与用考古学方法确定的年代相互印证。同时我们也要了解它的误差，如一个数据 ± 100 ，即是这个数据加100年和减100年的范围内，其真实年代有68%的机率在这个年代范围内。近年来应用加速器质谱技术，使所需样品减少，测定时间缩短，但并未解决其误差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苛求碳-14测年一定要准确到某一年，而是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对待。

对于一些测定的结果，要持谨慎的态度，有的重要的测定，需反复作，不要急于发

表。例如上世纪 70 年代在石家庄附近台西遗址出了件铁刃铜钺。商代出了铁器，是件大事。请一个研究所测定是冶铁，于是就发表了。后来又请另一研究机构测定结果为陨铁，是天然铁而不是人工冶炼的，这就不同了。发表了还要更正，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对于文物是不可再生的要有深刻的认识，用化学品保护文物，这方面的问题多。因为是实验性的，对能保存多久缺乏实践，因此要有可逆性，不然宁可不进行这种保护或加固。我在邳城遗址工作时，著名的“三台”遗址，铜雀台基址尚存一个角，存高 6 米，金虎台基址基本保存完好，南北 120、东西 71、高 12 米。这些都是不可移动的珍贵文物，对这样的夯土遗存如何保护是个难题。我们用一种笨办法，即培土保护，把真夯土保护着，外面是假夯土，塌落了再培土。后来听说有一种化学药剂注进去可加固夯土，但又经了解，如注入若干公分，这部分夯土很结实，但易塌落。目前还不能解决问题，需继续试验。对器物无损鉴定或测定，也是很重要的。前几年作玉器鉴定，要取样，在我们研究所后来发现并制止了。完整的玉器要损伤取样，宁可暂时不作，等到以后科学发展了再作无损鉴定也不迟。

我讲这些并不是针对什么人，而是讲过去一些经验教训，为今后多学科协作提供参考。总之，多学科的合作有利于考古学发展，新学科参加协作也越来越多，祝愿今后多学科协作取得更好的成果。

（本文系 1999 年 11 月提交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的论文提要、2003 年 7 月 24 日在“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后据录音整理，略有修改。）

三峡考古与巴蜀文化的新探索（纲要）

俞伟超

（中国历史博物馆）

一 关于探索巴蜀文化的简况

对于巴蜀文化的探索，始于1929年华西大学对四川广汉月亮湾的发掘，在那里，找到一大批早期蜀文化的石璧。至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的一批学者，见到传世巴蜀青铜兵器的形制、纹饰有特点，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又通过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成都羊子山、彭县竹瓦街、成都百花潭、涪陵小田溪等发掘，对巴蜀文化，尤其是战国前后的巴文化有了较多认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方面因广汉三星堆、成都十二桥的发掘，对早期蜀文化有了全新认识，另外又因配合长江三峡水库建设，在西陵峡地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工作，对早期巴文化也开始有所了解。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成都平原发现了新津宝墩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城遗址，同时在三峡地区也进行着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又在巫峡以西地段找到了同时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此外，在三峡库区的巫山双堰塘、云阳李家坝、忠县曾井沟两岸，又发掘出许多自商周时期至汉初的巴人遗存。有了这样一些新资料，现在可以对巴蜀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特别是文化特点，进行一些比较系统的探索。

二 长江三峡西端至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一致性及其来源的推测

成都平原宝墩等古城遗址和长江沿岸忠县哨棚嘴遗址下层的陶器，多夹砂粗褐陶，也有灰黑陶，器形以尖底、圜底和花边口沿为特色，皆手制，有粗细不等的绳纹、菱格纹、戳点纹、波浪纹等，器物的圈足部分或带镂孔，还有一些灰白陶，时代属前3000纪中叶前后。在成都平原，更早的新石器遗存尚未发现；在长江三峡一带，仅见奉节老

关庙下层或有更早的新石器遗存。这说明在此以前，这片区域人口稀少，遗址难找。

但类似的文化面貌，同已知的其他古文化都差别很大，可知其是自身发展起来的。

然而，其中的灰白陶，在已知文化中，在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中却很发达。圈足上的镂孔作风亦是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中盛行的。并且，宝墩等古城的城垣，皆无基槽而两侧有很宽护坡，同石家河古城的筑法一样。这就可以推测，大约有一些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石家河文化的居民，通过三峡进入成都平原，带去了不少文化影响，并促进了那一带文化的发展。

三 蜀文化源头的推测

以三星堆遗存为代表的早期蜀文化，是一种发达的青铜文化，以农业为基础，畜牧业也很发达，崇拜天、地、山川河泽和祖先，中心居住地有城垣。这一文化，是综合多支文化因素而成。

《尚书·牧誓》谓周武王伐纣，有蜀人加盟。

谯周《蜀本纪》和常璩《华阳国志》记载，蜀人始祖蚕丛，本居岷江上游，当属畜牧为生的氏羌族。其后柏灌（或作灌）、鱼凫向南迁徙，抵达成原平原西北边缘的“湔山”，即今茂汶一带。不久，滇北昭通一带的朱提男子杜宇和梁氏女利加入蜀人族群，成为首领，“教民务农”，“移治郫邑，或治瞿上”，自称“望帝”（《华阳国志·蜀志》），蜀人中心已达成都平原的彭县一带。杜宇又以治水有功的鳖令开明为相，并又禅位开明，号曰“丛帝”。鳖县即今遵义，开明当为夜郎之族，说明又有一支西南夷人融入蜀人族群。以后世代蜀王皆曰开明，九世开明迁至成都。战国时，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前316年），秦人灭蜀，开明氏王蜀十二世而亡，子孙流散于川西。有一支蜀王之子率众至越南北部称安阳王，秦汉之际被南越所灭。

从这些记载看，蜀文化当是由本地土著融入滇北昭通和黔北遵义一带的两支西南夷人，其文化当含有这三支文化的因素。

分析三星堆文化，其陶器皆手制，流行尖底、圜底器，多尖底杯、小平底罐、盆、盘和圈足盘、豆、灯座形器、封口盃、鸟头把勺等，正是继承宝墩文化而来。

有一种三角援戈，商周之际陕甘交界处常见，中原地区却难见到，当即来自氏羌之地。

一种长方形弧角镂孔铜牌，当源自二里头文化，青铜的尊、罍和玉圭、璋，当来自商文化。这大概都是通过中间媒介辗转影响而来。

但见，特别众多的人物或兽面纹面具、人头像，各种鸟兽附饰，是夏、商文化中缺乏的，而从战国以后情况看，正是云南滇文化等西南夷文化中发达的。昭通一带富有铜

锡矿，可能杜宇一支加入蜀人，正带来了发达的青铜工艺，促进了蜀人青铜文化的发达。

由此来看，早期蜀文化中正含有这三支文化因素。

四 巴人的两大支系

巴人以渔猎为生，起源于鄂西清江流域，又沿长江向上游发展，并到达嘉陵江流域和汉中，成为两大支系。

长江两岸的巴人叫廪君蛮，史称起源于武落钟离山，即今长阳的清江流域。有巴、樊、暕、相、郑五氏，以巴氏为帅。传称廪君魂魄世为白虎，表明以白虎为其图腾祖先。这支巴人与嘉陵江流域的巴人，界限很难分清。大体讲，东汉后曾向荆、湘等地发展，故《后汉书》将其归为“巴郡、南郡蛮”。唐、宋以后，南方的僚人，即其后裔。

嘉陵江流域的巴人主要有七大姓，汉时称板楯蛮或賫人。相传秦昭襄王时阆中巴人射杀白虎，平定虎害，秦及汉就常年免其租算，故汉时又称白虎复夷。但十六国时自陇西迁至汉中的李特一氏，还称为“廪君之苗裔”（《晋书·李特载记》），可见与长江的巴人族源相同。在嘉陵江上游至汉中，本多氏人，巴、氏长期共处，血统当混，故魏晋以后，又称巴氏。这支巴人，天性劲勇，特喜歌舞，故武王伐纣及刘邦自汉中出兵三秦，皆用为前锋，并将其歌舞采入宗庙之乐，东汉时并广传民间，习称“巴渝舞”。

周人克商后，曾封宗姬为“巴子”（《华阳国志·巴志》）。后又与楚通婚。楚共王正妃与楚灵王妃皆为“巴姬”（《左传·昭公十三年》与《路史·国名记》）。春秋时，巴已为楚国附庸，但又经常攻战。战国时，楚的西境最远可达枳，即今涪陵，巴之中心，被迫退到了江州，即今之巴县。

秦灭蜀后，随即灭巴，但政策完全不同。蜀人早已农业立国，秦即以郡县制管辖，大约经过200年左右，蜀文化已基本被秦、汉文化同化掉。巴人因是渔猎为生，秦、汉虽设郡县，但下面仍是大姓渠帅统领的各部。作为一种有自身特殊经济形态和信仰的族群，至少有一部分还长期延续，直到今天。

五 近年巴文化的新发现

通过近10多年来的三峡普查，在三峡库区，巴文化遗址（汉以前的）已找到百余处。大都为沿江的小遗址。但在巫山至忠县地段，已找到巫山大宁河畔的双堰塘、云阳李家坝、忠县普井河两岸遗址群等多处面积达数万平方厘米以上的中心遗址。

从这些遗存中的发现来看，西陵峡地段的，大都相当于夏至西周，晚期的较少。因

为楚文化在西周中期前后，已到达秭归（庙坪），巴文化主体被迫西退。

这一带的早期巴人遗存，陶器同三星堆文化属同一系统，灰黑陶与红褐陶都有，皆手制，以尖底器、圜底器及花边口沿为特色。石器多磨制的小型斧、凿、镑等木工工具，铜鱼钩较多，正反映出渔猎经济的特色。忠县瓦渣堆的陶窑窑场遗址，废品堆积，犹如小丘，几乎都是尖底或圜底的小罐，多为盛盐用物。这一带自古至今井盐业发达，这里当是古代巴人盐业的集散地，反映出了当时巴人的手工业的分工和商品交换已发展到相当程度。

涪陵小田溪巴人首领墓中发现的秦王政时期的成套编钟（14件，8件错金），说明巴人接受中原文化影响是愈来愈强，以致已模仿着中原王朝的宗庙之乐。

在战国至汉初，巴人之墓，几乎都随葬青铜兵器，反映出当时巴人是全民皆兵的。大约至西汉中期以后，传统面貌迅速淡化，正在加快融入汉文化。

六 巴文化中虎形图像的新认识

在战国前后的巴人兵器中，多见虎形图像，历来都以廩君魂魄世为白虎的传说来解释，以为是白虎图腾的表现。

但这种兵器上的虎形图像，同样见于蜀人的兵器上，还有蜀人的铜钲等乐器上也有。蜀人并无白虎图腾的传说，拿这种说法来解释蜀人兵器讲不通；而且，兵器是战斗用具，在兵器上多铸图腾形象，也不好理解。所以，巴蜀兵器上流行虎形图像，当另求新解。

在中国古代，一直拿老虎来表示勇猛，如《书·顾命》和《周礼·地官》便讲保卫天子的武士称为虎贲或虎氏。《周礼·夏官·鼓人》又讲在军乐中要使用钲于。现在所见最早的青铜钲于为江苏镇江王家山和丹徒北山顶的春秋晚期吴墓中所见，顶部皆有虎纽。再如战国以后的巴人钲于，甚至晚到汉末。巴人钲于皆有虎纽。钲于要作出虎纽，最合理的解释是此为战神的象征，祈求战士勇猛如虎。在众多巴蜀兵器上的虎形图像，应当是一种虎神即战神的象征。

但这并不否定巴人以白虎为图腾祖先的传说。据潘光旦先生研究，今之土家，为巴人后裔。据近年调查，三峡一带的土家，正供奉或祭祀木虎，并用白虎为门神，有的门楣、柱础墓碑或家具上，也常雕出虎形图像。这种虎形，就可能具有图腾祖先的含义。

七 东汉中期以后巴蜀地区神仙信仰的发达

西汉晚期，太平道在沿海的齐地形成。东汉顺帝时，太平道在黄河中、下游广为传

布，关中有骆曜所传缅甸法道，蜀中至汉中，则流行五斗米道。汉末黄巾起义后，张陵之孙张鲁占有汉中，聚居在嘉陵江至汉中的賸人几乎都信五斗米道，汉中成为政教合一的教区。在东汉，佛教依附于道教，民间信奉的西王母，亦进入道教信仰。在东汉中期以后，三峡地区和蜀中等地，非常流行一种青铜钱树，上面几乎都有羽人（即仙人）和西王母像，但亦偶见佛像。当时佛教既依附于道教，就可据此把钱树解释为道教遗物，从钱树流行的地区看，南至云贵西北至甘青交界地，东至三峡一带，北至汉中，正是天师道流行地区。这就可以看到钱树的流行正与天师道的流行重合。

当时的道教信仰，是一种内容非常混杂的神仙信仰，巴人的这种信仰是极为发达的。

以上是近十多年来通过成都平原至三峡一带考古新发现中得到的一点新认识。随着这一带考古工作的深入，特别是三峡考古的大规模开展，可以估计，十年之后，对巴蜀文化必将有一个系统的认识。

1999 年 11 月

重庆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白九江 邹后曦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

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以葛洲坝、三峡水利枢纽为代表的工程建设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鄂西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已比较清楚,基本确立了“城背溪文化(楠木园文化)→柳林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白庙遗存”的文化序列。而重庆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随着三峡文物保护的推进,其文化面貌特别是晚期的文化面貌也已逐渐清晰起来。本文亦拟根据新的考古发现,对重庆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分期与序列,以及文化命名问题进行粗略探讨。不当之处,希方家指正。

一 发现概况

重庆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考古发现,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1992年以前。

首先是1925~1928年,中亚探险队考古主任、美国学者纳尔逊(N. C. Nelson)在三峡地区进行调查,发现石器地点37处,其中12处地点采集到陶片。紧接着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埃德加(J. H. Edgar)也在三峡地区采集到一些石器。这些地点中应当有新石器时代遗址。

1949年后,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开始较多涉猎重庆峡江地区的文物和考古工作。

1957年,四川省博物馆等对忠县簪井沟和巫山县大昌西坝两处所谓“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调查^①。这两处所谓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以现有的认识来看,大多数遗物为商周及其以后的遗存。但此次调查开启了峡江西部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序幕。

1959年,四川省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与四川大学历史系对簪井沟遗址进行了试掘。从发掘简报的文字描述看,应有一部分新石器时代陶器,惜未发表这方面的线图^②。

1980年,重庆市博物馆对当时的重庆市属长江河段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22处”,同时,对江津县王爷庙遗址进行了试掘。^③王爷庙遗址出土的遗物相

对较丰富,包含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和石器。遗憾的是,发掘者将新石器和商周遗物混合介绍,描述和线图中也没有介绍遗物的地层单位,使我们失去了及早科学认识重庆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机会。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对原四川省万县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④。从其调查简报的材料看,至少在忠县曾井河中坝子遗址(即现中坝遗址)采集的陶片中包含了新石器时代遗物,其中一件标本(87SWZH:9)与后来发掘的老关庙新石器时代花边尖底缸口沿基本相同。

从以上情况看,本阶段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零星发现时期。工作主要以调查为主。人们对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认识才刚刚开始,常把商周文化遗存当作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尚未在工作中区分出单纯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第二阶段:1992~1996年,属于三峡文物保护制定阶段。

首先是调查工作。据《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及迁建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报告》介绍,三峡库区共有30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重庆库区以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为主。

其次,结合文物保护规划的制定,这一时期对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也进行了小规模发掘。比较重要的发现有如下三项:

1993年至1994年,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对奉节县老关庙遗址连续进行了三次小规模发掘^⑤。在下层堆积中,发现了尖底缸、壶、盆、钵、碗、豆和器盖等遗物的残片。第三次发掘简报认为:“老关庙下层遗物是瞿塘峡以西地区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早的遗存。这种遗存自身特征十分鲜明,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其时代很可能处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最迟则不晚于夏商时期。”后来,为配合古象馆的修建,重庆市博物馆、奉节白帝城文管所又对该遗址进行了第四次发掘^⑥。

巫山县魏家梁子遗址发现于1992年,1993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考古工作队与巫山县文管所进行了复查。1994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魏家梁子遗址进行了发掘^⑦。发掘所获陶器“器形有钵、盆、罐、豆、盘等,侈口罐和圈足器较多,罐口沿常见压印成齿状的花边”。发掘者认为,魏家梁子遗址是大宁河流域新发现的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遗存主要集中在第3、4、5层,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并可以划分为两期,年代约为距今2700~2000年。

忠县哨棚嘴遗址的试掘也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收获。该遗址是20世纪50、60年代调查的曾井沟遗址群的一部分。199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试掘了一个探方。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再次小规模发掘120平方米,将发掘的先秦遗存分为三期,其中第一期遗存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器类主要有罐、钵、盆、盘口器等,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两段^⑧。

除上述发现外,据报道,考古工作者还在巫山琵琶洲遗址、江东嘴遗址和忠县中坝

遗址等地点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物，但均未见正式的报道。

本阶段开始进行了科学的发掘，发掘者结合地层关系，参考周边地区的一些考古成果，已完全分辨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发掘的面积虽小，遗址数量也不多，但无疑是揭示重庆峡江地区新石器晚期文化真面目的阶段。

第三阶段：1997年以来至今，属于三峡文物保护实施阶段。

这一阶段的考古发现比较多，自巫山以上的峡江地区各区县均有或多或少的发现。据统计，截止2002年，共有30余处具有峡江西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特征的遗址^⑨。加上近几年的考古发现，实际数量应更多。

比较重要的考古发现，如涪陵陈家嘴遗址，丰都县玉溪坪遗址、秦家院子遗址，忠县中坝遗址、哨棚嘴遗址、瓦渣地遗址，万洲涪溪口遗址、苏和坪遗址、黄柏溪遗址，云阳大地坪遗址和巫山锁龙遗址等。这些发掘资料，有的尚未发表，已发表的主要见于1997~2000年度的《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

本阶段重庆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发现层出不穷，文化面貌揭示较充分，不单是文化的序列逐渐清晰，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各类遗存也大量揭露，人们对此的理解和认识也日趋深入。

二 文化既往命名概况

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重庆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逐渐引起人们的兴趣。

1984年，赵殿增在《四川原始文化类型初探》一文中，根据川东长江沿岸的一些调查材料，提出了“簪井沟类型”的原始文化概念^⑩。但是由于没有地层学上的依据，其将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文化遗物混入一个文化类型之中，“簪井沟类型”的文化内涵并不清晰。

1992~1996年，由于三峡文物保护规划阶段的一系列试掘，学者们根据考古发现掀起了一轮讨论和研究的小高潮。

吴耀利、丛德新依据魏家梁子的考古成果，首先于1994年在《中国文物报》提出了“魏家梁子遗存”的认识，随后在《四川省巫山县三峡工程淹没区地下文物保护规划报告》中建议将这类遗存命名为“魏家梁子文化”。1996年，他们发表专文讨论“魏家梁子文化”^⑪，认为以魏家梁子遗存为代表的遗址外，还有巫山琵琶洲和江东嘴、奉节老关庙、忠县瓦渣地和哨棚嘴、合川沙梁子、江津王爷庙等遗址，都分布在四川盆地东部的长江沿岸地带，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不同于大溪文化等其他任何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四川东部地区长江沿岸地带新发现的一个史前土著文化”，时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